

文献学语境中的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原初理论平台

(代译序)

张一兵

第一次接触广松涉这个名字是在 1988 年。当时,我正着手对新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篇的手稿^①进行比较系统的文本学研究。在一查第二手评述资料中,我首次接触到了这位日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以及他这个已经十分著名的文献版。说来也巧,囿于条件,当时既无法获得第一手的日文文献,也没能看到该文本的具体内容,但在自己的独立研究中,我竟然也得出了某一个与广松涉的观点颇为类似的研究型判断。^②这就让我对广松涉版的这一稿本油然而生出浓厚的兴趣。也因此,在南京大学出版社确定出版广松哲学系列之后,我特意选择了广松涉这本《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广松这个版本出版于上个世纪 70 年代。其实,之所以选译此书,还有一个重要的考虑,那就是迄今为止国内尚没有一本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版本考据方面的文献学研究论著,因此我十分希望这个译本的出版多少能补上这个空白。^③在这篇代译序中,我打算先简要介绍广松涉的学术履历,而后粗略讨论一下这本书复杂的历史语境和基本情况,最后一部分是本文的主体,我将在其中粗略谈谈自己对马克思恩格斯这一手稿研究的基本看法。

—

广松涉,当代日本著名的新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和当之无愧的思想大师,然而时至今日,广松涉在中国学界,尤其是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域中,基本上还算是一个比较陌生的名字。其实,被我们长久忽略了广松那兼容了新科学观、当代西方哲学和马克思的批判精神,以及带有浓郁东方文化色彩的哲学思想是相当博大精深的,并且,自 1994 年广松涉去世之后,其学术影响还在逐步扩大。

① 《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篇手稿新编中文单行本——《费尔巴哈》一书,由人民出版社 1988 年首版。其基础为 1965 年出版的前苏联专家巴加图利亚所编辑的版本和 1966 年前东德马列研究院出版的新德文版。中译本原来使用了“第一章”,由于广松涉认为这一部分手稿包含了 A 章和 B 章结构,所以他改用“第一篇”来指认这一手稿。我们为了对应广松涉的这个版本,故采用“第一篇”的指称。

② 即对手稿中“遗失”的第 36~39 页文本的判断。

③ 其实,也正是因为译介上的这个不足,有些论者将版本研究误认作诠释学意义上的“文本学研究”。

广松涉,生于1933年8月11日,日本福冈县柳川人。^①1944年,刚上小学五年级的广松突然迷上了爱因斯坦,立志成为一名物理学家。和许多由自然科学转向哲学的当代大师相同,这个志向成为广松一生的思之起点。1945年,尚就读于小学六年级的广松又有惊人之举,他在通读卡尔·皮尔逊著《科学概论》之后,对马赫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可以说,马赫关系性的感觉要素图景,事实上成了广松步入现代科学构架的重要路径。也是在这一年,年仅12岁的广松在日本共产党员伯父平木恭三郎影响下,不可思议地读完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这次远远超越其年龄、阅历的文本阅读一举奠定了他左派思想的学术根基。1947年,时读中学二年级的广松涉发表了第一篇学术论文,题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该文中心思想是讨论原子弹问题,尤其重点阐述人文社会科学对自然科学的优势。1949年,16岁的广松涉正式加入日本共产党,从此开始了为社会主义战斗的一生!

1951年,广松涉开始意识到近代自然观(实体主义)向现代自然观(关系主义)之重大转变的意义,并就此模仿黑格尔的《逻辑学》,写成了十四本篇幅的“逻辑学笔记”。1952年,广松报考东京大学理科不第,转而进入东京学艺大学数学系,并于同年开始系统学习哲学,从物理学转向形而之上的哲学。1954年,广松涉终于考入东京大学(文科)。其间,他多次因革命活动中止学业。1957年,广松涉正式进入东京大学文学院哲学系,不久之后,他将毕业论文题目由入学时预定的哲学家黑格尔变更为科学家马赫。广松此举,深受桂寿一主任教授的称赞。学间,广松专心致力于现象学和新康德派研究,以此作为自己的前提作业,并为研究之需,坚持每天到红露外语学校学习德语。次年,广松涉更是集中精心致力于康德、黑格尔、语言学、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研究,到当年夏天,已经基本奠定了毕业论文的主要内容框架。1959年,广松涉从东京大学哲学系毕业,毕业论文题为《浅论认识论的主观》(收录于《广松涉著作集》第16卷)。值得一提的是,在这篇论文中,他已经开始构筑交互主体性、四肢结构论等广松哲学的基本框架。同一年,广松考入东京大学研究生院人文科学研究科哲学专业深造。1960年,他开始关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文本结构问题,并直接批评苏联的梁赞诺夫版和阿多拉茨基版在编译上的非法文本重构(由此导引了后来苏联马列主义研究院1965年的巴加图利亚新译本的问世)。次年底,广松完成了题为《康德的先验演绎论》的硕士论文,后又于1962年继续修习博士课程。其间,广松与须藤吾之助合作翻译了马赫的《感觉的分析》一书。1965年,广松涉在修满博士课程的学分之后,从东京大学退学,从此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职业哲学家的道路。

1965年以后,广松涉先后出任名古屋工业大学讲师(德文)、副教授(哲学和思想史);1967年出任名古屋大学教养部讲师,1969年晋升为副教授(哲学与伦理学);1976年以后,出任东京大学副教授、教授,直至1994年退休。同年5月,广松涉获东

^① 广松涉出生于日本山口县厚狭郡。但由于他在地生活的时间不长,再加上厌恶明治以后长期控制日本政局的“萨长”(萨=萨摩藩,今鹿儿岛县;长=长州藩,今山口县)派系,所以一生都以福冈县柳川人自称。以下关于广松涉生平叙述,依据小林昌人编写的广松“年谱”(《广松涉著作集》第十五卷,岩波书店1997年版)。

京大学名誉教授的称号。当月,广松涉因患癌症去世。

广松涉生前出版论著 40 余部,论文数百篇,其中在他辞世后出版的有《广松涉文选》六卷和《广松涉著作集》十六卷。如今,广松涉已是日本学界公认的当代哲学大家。纵观广松涉思想的整个发展进程,我们可以看出,青年广松涉是从对现代自然科学特别是现代物理学的关注出发,进而转入理论研究的,在这方面他有着非常独到的见解[《科学的危机与认识论》(1973)、《相对论的哲学》(1986)],这段思想经历同时也是他后来毕生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建构广松哲学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和逻辑视角。必须看到,广松涉哲学之思的另一个重要基础是西方哲学:先是康德、黑格尔,而后是胡塞尔和新康德主义,还有舍勒、梅洛-庞蒂,但是,对他影响最大的还是海德格尔。广松涉在这方面的论著有《黑格尔》(1976)、《梅洛-庞蒂》(1983)、《交互主体性的现象学》(1986)、《现象学的社会学原型——许茨研究笔记》(1991)。

如前所述,二战以后,广松涉直接投入日本新左翼的学生运动狂潮中,并在革命实践中毅然转向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尤为可贵的是,从一开始,广松涉眼里的马克思就不是端坐神坛的圣人,广松涉从不将马克思主义奉为一成不变的金科玉律,而总以独立的探索精神不卑不亢地来面对马克思主义。在这一点上,广松涉的理论逻辑思路十分接近西方马克思主义。广松涉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努力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文献学地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包括《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像》(1971)、《新编辑版〈德意志意识形态〉》(1974)、《资本论的哲学》(1974)、《马克思的思想圈》(1980 年);二是对马克思主义思想史的发生学研究,其中出版有《恩格斯——其思想形成过程》(1968)、《马克思主义的成立过程》(1968)、《马克思主义的地平线》(1969)、《青年马克思论》(1971)、《马克思主义的路径》(1974)、《物象化论的构图》(1983)、《以物象化论为视轴读〈资本论〉》(1986);三是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的关系,主要论著为《现代革命论探索》(1970)、《“现代超越”论》(1975)、《新左翼运动的射程》(1981)、《历史唯物主义与国家论》(1982)、《历史唯物主义与生态史观》(1986)。

对广松涉来说,当代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并不应当狭隘地停留在马克思主义 19 世纪的文本中,而要在当代科学和社会实践的新层面上将其“推进”和“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这就是广松涉自己的哲学体系——“事的世界观”[《世界的交互主体性的构造》(1972)、《事的世界观的前哨》(1975)、《物、事、语》(1979)、《辩证法的逻辑》(1980)、《佛教与事的世界观》(1981 年)、《存在与意义——事的世界观之奠基》(计划三卷,其中第一卷 1982 年出版,第二卷 1993 年出版,第三卷因广松涉 1994 年的去世而未果)]。

广松涉哲学在中国的介绍与研究,最早是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卞崇道先生开始的,他在多本关于现当代日本思想史的论著中对广松涉思想进行了介绍和一般评述。此次,在广松涉夫人和广松涉一批学生和生前好友的直接支持下,我们得以在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当代学术棱镜译丛”中开出一个“广松哲学系列”,并通过版权贸易,从日本不同出版社购得广松涉的《事的世界观前哨》、《物象化论的构

图》和《存在与意义》(第一、二卷)的中文版版权。2002年,我们与日本一批研究广松涉哲学的专家、学者联合,在南京大学召开了第一届“广松涉哲学思想国际研讨会”。目前,上述已购得版权的三本书中,前两本已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存在与意义》一书的翻译也已初步完成,正在由中日双方专家做进一步的审校。眼前这本《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正是这个系列的第四本书。我们业已与日本学者商定在2005年上半年,双方将再次联合召开第二届“广松涉哲学思想国际研讨会”,那次会议的主题应该就是这本《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二

以下,我们不妨先来看看1974年由河出书房新社出版的广松涉这本《新编辑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历史语境。^①

众所周知,撰写于1845~1846年的这部名为《德意志意识形态》(此书的全名为《德意志意识形态 对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所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的重要哲学论著,在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并没能公开发表,其中最重要的第一篇手稿甚至尚未完成。《德意志意识形态》全书分为两卷八篇,约50张手稿。第一卷由序言和三篇构成,主要内容是对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施蒂纳等人哲学观点的全面批判以及对马克思恩格斯自己的新世界观——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的正面说明。第二卷由五篇构成,主要批判了所谓的“真正的社会主义”思潮。现在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三卷中只留存有马克思恩格斯完成的第一篇、第四篇和第五篇。可能没有包括赫斯等人撰写的手稿。从现有的资料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时,本打算全面批判当时德国的哲学和社会思潮。第一卷主要批判青年黑格尔派,但重点指向费尔巴哈,因为根据马克思已经拟定的新世界观提纲,新的思想革命正是产生在对费尔巴哈哲学思想逻辑的直接否定之上。但是,在撰写第一卷的初始,马克思恩格斯其实并不打算以单独一篇的篇幅来正面阐述自己的新世界观,后来那个第一卷的结构是在写作过程中,随理论逻辑的发展而自然形成的。必须看到,在马克思恩格斯共同创立哲学新视界的过程中(《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撰写本身也是这一思想革命的一部分),目前被马克思恩格斯设定为第一篇的内容相当重要,因为他们认为只有费尔巴哈才值得被“认真对待”,并且,哲学新视界的确立主要也是针对费尔巴哈哲学的理论界定,或者说,是在“超越费尔巴哈”(列宁语)中创立的。

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写作,大约从1845年11月(《维干德季刊》第三卷发表)开始,主体部分于1846年4月基本结束,到了1847年1~4月,恩格斯又补充了第二卷的最后一篇《真正的社会主义》。从文本和最新的研究资料来看,马克思恩格斯当初并不打算写一本大部头的论著,而只是试图针对《维干德季

^① 广松涉编注:《新编辑版〈德意志意识形态〉》,河出书房新社,1974年。即我们面前的这部重要的文献学论著。在译成中文时,我们将书名改为《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

刊》的德国哲学界的混战提出自己的看法,主要目的是想界划他们已经获得的新世界观与被超越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根本异质性。所以,第一部分手稿起初并不曾分出章节,而是作为共同批判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施蒂纳的内容。只不过在写作的进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决定另辟专篇批判后二者,于是便删去了第一部分手稿中有关鲍威尔和施蒂纳的内容,最初的手稿也随之成为第一篇的第一部分。接下去,是计划中的第二篇和第三篇的写作,到了第三篇的写作中,也有两部分溢出研究对象的手稿被划出来反构成第一篇的第二、第三部分。然后,是“莱比锡宗教会议”的写作。此后,马克思恩格斯为全书起草了序言,也是在这个阶段,马克思恩格斯又两次重写了第一卷的开始部分,从而构成后来第一篇手稿中的最后一批文本。最后,是第二卷。^①

《德意志意识形态》直到恩格斯去世(1895年)37年之后的1932年才在苏联首次出版。^②这本书的第一篇从正面集中阐述了马克思新世界观,也就是说,《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第一篇是马克思主义创立后,马克思恩格斯两人对自己哲学新视界的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正面的系统的表述。^③所以,这也是我们真实认知马克思主义哲学最重要的经典文本之一。可是,这部分手稿又恰恰是马克思恩格斯两人生前未能完成的手稿。并且,手稿在漫长的岁月中又屡遭损坏,其中几张严重破缺,第一篇也遗失多页(第二篇还缺20页)。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当时撰写的情况看,原稿应该是由多个手稿构成的,在后来的保存中其中部分手稿先后有所遗失。现在我们在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时传统所用的完整中文文本主要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这一文本,特别是其中的第一篇,主要是以1932年前苏联学者阿多拉茨基的第二个版本(第一个版本由梁赞诺夫1924~1926年整理出版)为基础的。由于这一版的文本打乱了马克思恩格斯原稿的顺序,并依据编者个人的理解进行了重新编排,从中已经很难看出第一篇的理论结构原貌了。

在后来的研究中,人们逐步意识到苏联学者原先对第一篇手稿的编排并不十分令人满意。其一,1962年,国际社会历史研究所巴纳(S. Bahne)在整理资料时,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发现了夹杂在马克思其它遗稿当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遗失”部分

① 据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和其他文献,我们还知道手稿中的第五篇“库尔曼”的原稿是魏特迈誊清的,稿末写明该稿是赫斯写作的。另外,赫斯作为此书的合著者,还撰写过批判“卢格”篇,出版计划受挫后稿子被退回给赫斯。

② 1899~1921年,《德意志意识形态》的部分章节曾被发表。1924年,前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编译后,首次用俄文发表该书的第一篇。1926年,又在《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一卷(Marx—Engels Archiv, Bd. I. 梁赞诺夫编)发表该书的德文版。1932年,前苏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第一版, Marx—Engels Gesamtausgabe, I. MEGA1, 阿多拉茨基编)第一部分第五卷中首次用德文发表《德意志意识形态》全部书稿,次年又出版了俄文版(第一版第四卷)。这是后来流传甚广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版(第三卷)中《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原型。中文版是译自完全相同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中的第三卷。

③ 这个表述主要是通过“清算”马克思恩格斯自己“从前的哲学信仰”,即“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而在这种批判之前,马克思恩格斯在书中的第一章里正面阐发了“我们的观点”。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三卷,第10页。

的三页手稿(即第一篇中的第 29 页,以及一个无法归属的残片两页,同时发现的还有此书“第三篇 圣麦克斯”原稿的一部分)。同年,巴纳在《社会历史国际评论》第七卷第一部分中,用原文将这三页手稿发表。^①其二,许多研究者开始注意到恢复马克思恩格斯原稿中的初始逻辑线索十分重要。青年广松涉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篇手稿的研究和批评是引发这种意见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由此,1965 年苏共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在《哲学问题》杂志第 10 期和第 11 期上重新发表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篇的新编译本。次年,又出版了该文献的单行本。这个版本是由前苏联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文献专家巴加图利亚准备,勃鲁什林斯基编辑的。这一次的编排基本恢复了马克思恩格斯原稿的编码次序,并根据手稿内容把原有的五份手稿(广松涉将前三个手稿指认为“大束手稿”,后两个手稿为“小束手稿”)分成四个部分,共二十七节,并根据编者对手稿内容的理解拟定了二十五个小标题(其中第一节是原有标题,第二十六节以作者边注为题)。1966 年,东德《德国哲学杂志》第 4 期用原文重新发表手稿,编排基本参照了上述俄译本,只删除了巴加图利亚等人加上的二十六个节标题。后来,1972 年出版试行本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历史考证第二版,Marx—Engles Gesamtausgabe II,以下简称 MEGA2)也收入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篇,其编排基本与 1965 年俄文版相同,只是将手稿划为七个部分,并保留了作者在稿边上的批注。1988 年,我国人民出版社《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篇手稿的新编译本——《费尔巴哈》也宣告问世。^②这个新译本的主体参照了东德 1966 年版的稿,并将俄文版的二十七个小标题附在书后,成了我们国内研究者手中《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篇手稿的新版中文版单行本——《费尔巴哈 唯心主义观点与唯物主义观点的对立》(以下简称《费尔巴哈》)。^③后来中文第二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也沿用了这一版本。因此,此刻摆在我们面前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篇手稿的中文版单行本,与原有的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实际上是阿多拉茨基版)相比,不论是在结构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有了十分重要的变化。在这个中文新版本中,马克思恩格斯原先那五份手稿被分为四个部分。编辑者将马克思恩格斯第一篇手稿的五个相对独立的手稿,按时间顺序分别编排为:最初写下的具体说明哲学新视界的第一手稿的 29 页,现在被编为第二部分;从已成稿的第三篇中两处抽取的第二、三手稿计 43 页,现在被编为第三、四部分;最后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完成大部分手稿后,两次起草的全篇导论和对新世界观进行总体概括的第四、五手稿,它们被整合编辑为第一部分;而新发现的三页手稿,除第 29 页编进原序位以外,另外两页按原有的页码编在了第一手稿的最前面。同时,新版手稿还恢复了马克思恩格斯原稿上的许多重要注释和说明,并对手稿做出了一些近似文献学的说明,如在

① 1979 年,中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收入了新发现的第一篇相关的三页手稿。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第 368~372 页。

② 《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新编第一篇手稿——《费尔巴哈》一书(中文新版),由人民出版社 1988 年首版。

③ 这是恩格斯在 1883 年马克思去世后重新阅读马克思手稿时所加的尾注。手稿原件上本来只有“1. 费尔巴哈”。

文本中保留了马克思的原有页码(但没有保留恩格斯的纸张序号)。在这一版中,新增了近一万余字的新内容(这个版本的基础是新德文版,它主要参照了由前苏联学者巴加图利亚准备、勃鲁什林斯基编辑的新编俄文译本。参见苏联《哲学问题》杂志1965年第10、11期)。^① 我以为,这一版本为中国学者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初始理论线索提供了重要的文本依据。

广松涉对《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研究起始于上一世纪50年代末。早在1959年就读东京大学研究生的时候,广松涉就参加了名为“理论集团”的学习会。会员们在这个学习会上轮流阅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广松便是从中意识到该书当时的两个版本(梁赞诺夫版和阿多拉茨基版)在编辑上皆有问题。同年春天,广松又设法借到了法政大学田代正夫教授收藏的梁赞诺夫编辑的MEGA1的德文原版;第二年春天,通过城山登副教授的介绍,又从东京大学教养系淡野安太郎研究室借来了《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一卷(Archiv I)。以此为基础,广松涉在次年参加了东京大学研究生院伦理学科的金子武藏教授所担任的“精神史的方法”讨论课(研讨正好以《德意志意识形态》做教材)。作为听课的作业,广松涉完成了以探讨《德意志意识形态》已经存在的两个不同版本的异同以及在编辑上的问题的报告。1965年,此文在日本《唯物论研究》春季号上发表,引起广泛的关注。1966年3月,广松涉又针对新出版的巴加图利亚版发表了《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苏联新版》一文,此文刊登于《图书新闻》第851号上。1967年6月,广松涉再次针对新德文版在《思想》杂志上发表了《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编辑问题——有感于东德新版的出现》的文章。1972年,由前苏东马列主义研究机构主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国际版(MEGA2)发表《德意志意识形态》新译版(试用本)。^② 经过这一系列艰苦而认真的努力,1974年,广松涉终于在河出书房新社出版了自己这本《新编辑版〈德意志意识形态〉》,这可以说是广松涉针对《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所开展的长达十五年的研究的最终成果。

三

那么,广松涉这个新版《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过人之处到底在哪里呢?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先看看这五个不同版本的基础——《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篇手稿的具体情况,而后再来逐一研究一下广松版之前问世的该书另几个不同版本的情况。

如前所述,《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篇是马克思恩格斯生前尚未完成的手稿。1962年以后,该书三个新版本所处理的文本基本上由以下几个部分构成:一是由马克思恩格斯最初完成的作为第一篇手稿主体部分的三份手稿;二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完成书稿主体之后撰写的全书序言和修订稿的内容,这里实际包括多次写作、修改构成的多层份手稿;三是1962年新发现的三页手稿中的一个无法归属的残页。

^① 参见拙文:《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手稿的结构》,《理论学习月刊》1992年第10期。

^② 关于MEGA2的基本情况,可参见拙著:《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附录二。

为方便中国读者,我们以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的《费尔巴哈》单行本为参照展开分析(以下简称中文版)。依照广松涉的看法,马克思恩格斯的手稿可分为两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是马克思恩格斯分几次完成的第一篇手稿的主体部分,它们被广松涉称为“大束手稿”(第一、二、三手稿,即中文版第一篇正文中的第二、三、四部分和“国家和法同所有制的关系”);第二个部分是马克思恩格斯直到最后还在修改的手稿,被广松涉称为“小束手稿”(第四、五手稿,即中文版中的第一篇序言和第一部分的主体内容)。上述手稿都写在大约 20×30 厘米的大开纸上,纸张大小略有差异(四种)。^① 作者在写作时,先将大开纸中心对角一叠为二,使一张大开纸成为正反四页(面)手稿。对这些手稿,恩格斯的作法是在每一大张纸上标注纸张序号,而马克思则是在每张纸的四页上加上页码序号^②,但大张纸上的空白页和全文删除的部分都没有编页码。所以,后世人们拿到的原始手稿上就有两种不同的编号。^③ 写作中,马克思恩格斯通常将正文写在每一页的左栏,而右栏则供修改和插入文字使用(这一点可以从本书所附照片中看到)。另外,全部手稿的主要笔迹是恩格斯的,属于马克思的笔迹只有为数不多的插入内容和文字修改。

从这个情况来看,大束手稿一共有 17 张大纸,包含三份手稿(广松涉称为“三个部分”)。第一手稿共六张大纸,计 24 页,恩格斯的纸张序号从第 6 张开始,一直到第 11 张(用{6}到{11}表示),马克思的页码从第 8 页一直到第 29 页,其中,第 10 张纸的第一面({10}a)和第 11 张纸的第四面({11}d)中没有马克思的页码;第二手稿两张大纸计 8 页,恩格斯的纸张序号为第 20、21 张(用{20}和{21}表示),马克思的页码从第 30 页到第 35 页,其中第 20 张纸的第一面({20}a)和第 21 张纸的第三面({21}c)中没有马克思的页码;第三手稿,共九张大纸,计 32 页,恩格斯的纸张序号从第 84 张到第 92 张(用{84}到{92}表示),马克思的页码序号则是从第 40 页到第 72 页,其中,第 72 页正好是第 92 张纸的第一面(第二面({92}b)中没有马克思的页码,其余 2 面空白)。大束手稿的内容在《费尔巴哈》中是从现在我们看到的单行本第 19 页第二自然段开始,一直到第 82 页。小束手稿则由七张大纸组成,其中五张大纸只有恩格斯的第 1~5 张的序号(用{1}到{5}表示),其中第 4 张纸只用了第一、二两面;另外两页既没有纸张号也没有页码序号,其中第 2 张只写了一面。广松涉将这两张纸标注为“{1?}”和“{2?}”,并用{1?}的第 a、b、c、d 页和{2?}的第 a 页加以列数。这一部分的内容,在中文版中是第 1~17 页。最后是一份手稿的片断,即 1962 年发现于其他文稿中的三页手稿中的两页(另一页为第手稿中的第 29 页),此张纸的文字写在第三、四两面上,上有马克思标注的第 1、2 页。此内容为中文版的

① 中央编译局的文献学专家在中文版中对这些纸张使用了“印张”的概念,因为“印张”一语为出版业务中一个特有的专业术语,通常是指一张整开纸正反印足文字的计量。而经过我们反复讨论,确认这里应该使用“纸张”概念来说明马克思恩格斯书写文字所使用的不同大小的用张。“印张”一语的使用可参见:《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95 页注 2;第 96 页注 9;第 99 页注 33;第 100 页注 39。

② 1988 年出版的中译本,只保留了马克思的页码编号。

③ 这里还有一个文献学细节是,马克思一开始是用[6b][6c][6d][6e]这样的方式来标记恩格斯标记的第{6}张纸,后来才改为[8][9][10][11]。

第 18 页和第 19 页的第一自然段。广松涉将其标注为手稿“Ⅰ”。

对这些文本的手稿,广松涉之前的四个版本分别做了如下编辑:

一是梁赞诺夫版(以下简称梁版,此版本文本中没有 1962 年新发现的三页手稿)。根据广松涉的说法,梁版的编排方针是“将手稿中的文章如实地排成铅字”。^① 所以,文中被删除的部分用小号字排出并加以括号,马克思所增写的内容、边注和其他信息在脚注中进行了说明。梁版的文本编辑是先排印小束手稿中的{1 ?}的第 a、b 两页,内容重复的{1}被看作它的修改稿,然后是{2}、{1 ?}的 c、d 页和{5};接下去排印大束手稿的三个部分,即{6}到{92};最后是{3}和{4}。

二是阿多拉茨基版(以下简称阿版,此稿同样没有 1962 年新发现的三页手稿)。广松涉对这个版本持否定态度,用他的原话评价就是该版本“先把手稿拆得七零八碎,然后用浆糊和剪刀进行剪贴”:

阿多拉茨基的剪贴,并不是以段落为单位来重新编排,而是将一个段落拆开,将剪切下来的部分与在完全不同的行文逻辑中撰写的,在手稿中相隔几十页的文章一部分连接在一起,从而构成新的段落。其做法可以说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而且,在手稿的剪贴难以巧妙地进行时,竟然擅自插入连接的词句!^②

所以,广松认为阿版简直就是一个“赝品”。广松这个“赝品”,实际上概括了我们沿用几十年的那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三卷中《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篇的情况。遗憾的是,缺乏第一手文献学研究基础的我国学者对此却浑然不觉。

阿版只收入最终改定的文字,对那些删改、加写的内容,他只在尾注中做了个一次性说明。在手稿排印上,它将小束手稿全部排在前面(其中还插入了从大束手稿中抽出的内容),开头部分基本是按照{1}、{2}、{1 ?}c~d、{2 ?}、{3}、{4}、{5}的顺序排列的,而大束手稿(被抽取的内容除外)则被切成了几十个片断,在东拼西凑之后,形成了我们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三卷中能看到的篇章结构。

三是 1966 年由前东德当局出版的新德文版。在上文中我已经交待过,这个版本其实就是我们手中那个《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篇手稿的新译中文版的被译对象。因此,它的基本情况我们大略是了解的。在此,我只想简单地提示几点:第一,这个版本实际上是 1965 年巴加图利亚俄文版的一个复制本。大概因为广松涉本人不懂俄文,所以他总是以内容基本一致的新德文版为例。第二,广松涉认为,这个版本“采取的是将手稿的最终文形按页码顺序活字化的基本方针”^③,之所以这么说,主要是因为该版编辑者采用了以马克思留下的文本页码顺序来对手稿进行排印的做法。所以,文本中没有保留恩格斯在纸张上所做的序号,而只是将马克思的页码序号以

① 参见:《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编辑说明”第 7 页。

② 广松涉:《关于〈德意志意识形态〉编辑中存在的问题》,《唯物论研究》第 21 期(1965 年春季号)。

③ 参见:《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编辑说明”第 9 页。

加括号的方式插入文本之中(这一点,我们在中译文本中能够看到)。第三,新德版对被删除的字句、增写内容、修改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不同笔迹等几乎没有记载,但在脚注中,对重要的删除文、被大幅度修改过的语句的原形却进行了注释。

正如我们在中文版中已经看到的,从手稿排印上看,新德版一开始是作为序言的{1}、{2},接下来是编为第一部分的{1 ?}c~d、{2 ?}、{3}、{4}、{5},然后,作者将手稿片断“ I ”插入第一部分的开头,而后再接排{6}~{92},最后才是马克思的附录。

最后一个版本是 MEGA2。广松涉当时手中的文本是 1972 年前苏东当局发行的 MEGA2 部分样卷的试印本,那主要是一个用于征求意见的稿本。对该版本,广松涉的评价是:“登载手稿的最终文形,而将关于修改过程、增补以及笔迹等的信息在‘异文详情’中一次性进行记载”。^① 由于是历史文献考证版,所以这个版本应该说是文献学意义上最为完整的一个版本,其主要特点为:一是将没有指定插入位置的边注以及笔记类的文章排印在栏外,被删除的语句都用“〈〉”括起,并标注了其所在的位置;二是对那些被修改过语句的处理方法是将原来的语句和修改后的语句一并记载,并标明在正文中的页码和行数;三是将删除、修改、润色等前后的文形以上下对应的形式记载。后来插入的语句、马克思撰写的语句亦即马克思删除的语句等等的区别,也用各种符号在卷末的“异文详情”中作了标注。

手稿的排印顺序为:先排印{2},然后是{1}、{1 ?}、{2 ?}、{3}、{4}、{5},在插入手稿片断“ I ”后,再接排{6}~{92},最后是马克思的备忘录。

四

现在,我们可以来看看广松涉对自己新编版本的说明了。关于该书的编辑方针,广松涉做了一个颇为详尽的说明,我们照录如下:

本版采取的是将手稿中每页的状态(包括删除、修正、增补、笔迹、栏外笔记等等)以及手稿的内在构成(大小束手稿之间的内在关联、基底稿及其异稿、大束手稿的缺损部分和小束手稿的誊清稿之间的关系、栏外的增补文章与原来的文章的呼应关系)能在直观上一目了然地体现出来的编辑方针。^②

具体而言,广松涉力图使他的版本排印与原手稿“逐行对应”,但由于排印技术所限,这个愿望(我们这里的中译本也未能做到这一点)最终并没能实现。他说,如果能“将各页像照相一样排印出来是最理想的。但是,由于存在着印刷技术、经费方面的制约,不得不放弃将写在手稿行间的文字也排印在行间这样的完全对应的方式”。^③

① 参见:《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编辑说明”第 10 页。

② 参见:《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编辑说明”第 11 页。

③ 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附录一“《德意志意识形态》在文献学上的诸问题”,第 342 页。

但十分难能可贵的是,广松涉在自己的版本中对前人的作法进行了如下重要改进:一是首次采用双联页排印的方式(手稿正文印在左页,相关文本印在右页),将手稿中新旧文本(原稿与誊写稿以及部分重要的增写内容)以左右两页并排的形式展示给读者;二是用不同字体将恩格斯与马克思所写的内容区别开来(中译本中马克思的文字用楷体字,恩格斯的文字用宋体字),这使读者能更直观地了解原手稿在文本写作上的真实情况;三是将被删除的内容用小号字体排出,并直接存留在原删除的文本位置上,并且标注了马克思恩格斯用横线与竖线删除的差异;四是用不同标记明确注明马克思恩格斯增写与改写的文字;五是关于不同版本的各种信息,被如实反映在手稿的排印中(我们的中译本又增加了日本学者小林昌人先生和涩谷正先生的两个最新版本的信息);六是广松涉在自己的日文版后,以独立成书的形式排印了按照他自己的理解结构的德文原稿,这就提供了文本研究上的一个直接来自于母语文本的比较参照系。^① 毋庸置疑,这些做法都使广松版具有了更高的文献学价值。

在对手稿结构的理解上,广松涉的看法与以前的版本有较大差别。依他的构想:

在大束手稿的开始和途中有缺损部分,但是那不是真正的佚失,而是应该用小束手稿中的改订新稿来填补的内容。小束手稿的剩余部分,是与大束手稿的某处(正文的开始部分)相对应的改订异稿。因此,笔者主张采取将大束手稿按照马克思标记的页码排列,用小束手稿中的改订新稿填补缺损部分,另外将小束手稿中的改订异稿与大束手稿的对应部分对照排列(按双联页的形式,即左页为大束手稿,右页为与之相对应的小束手稿中的异稿)的方式。^②

请注意,这是广松涉对手稿结构最重要的一个独特理解,他根本不认为手稿真的有所遗失,在他看来,手稿中看似遗失了的部分实际上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后来对手稿结构所做的调整。广松涉认定,如果将小束手稿中改订文本重新调整穿插进大束手稿的缺失处,我们就能获得基本完整的第一篇手稿的主体。广松涉认为,“通过这样的处理,第一篇的遗稿不再是零散片断的拼凑,而是具有一定的连贯性”的完整文本。正是出于这种理解,在手稿排印上,广松涉首先将马克思为《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所写的序言置于全书的起始部分,其实,这个文本并不直接属于第一篇手稿。^③ 对此,广松涉解释道,这是第一编导论的“关联性”文本。接着是作为第一编导

① 也因为广松涉有很好的德文基础,所以在德文手稿中他才能发现马克思与恩格斯在“缀字法”上的不同,以更多地获得文本研究所需要的重要信息。另外,广松涉在河出书房新社 1974 出版的这个版本,采用了一个硬纸封套合装两个精装本(日文书与德文书)的方式。此书的装帧设计获了出版奖。

② 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附录一“《德意志意识形态》在文献学上的诸问题”,第 342~343 页。

③ 我们可以在本书所附的文本照片中看到,它是写在三张信纸上的。作为相关文本,还有作为附录二的恩格斯的“关于费尔巴哈”手稿。此稿已经收录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一版)第四十二卷的第 360~363 页上。

论的小束手稿中{1},与其他版本十分不同的是,广松涉将{1?}的a~b页作为{1}的誊改手稿,以双联页的形式并排刊印在主文本的双联右面。再下来的手稿排印就是极为复杂的编辑工作了。广松涉先是在右页正文中排印了第一章绪论的{2}(即文本中的A章,他不同意MEGA2将{2}放置到{1}之前的做法),然后直接排印作为主要手稿正文的大束手稿中的{6}~{92}。与原先大多数版本不同,广松涉将{1?}c~d、{2?}、{5}作为一个文本整体,视为大束手稿中马克思恩格斯下面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11}~{16}改写异文,所以,他将这部分文本直接连续排印在{11}~{16}正文的双联右页上。而关于小束手稿中的{3}、{4},广松涉则大胆地推断此文本就是大束手稿中那个遗失掉的第36~39页^①,因而,他又直接将这一部分文本直接排印在大束手稿左页正文中的第40页的前面。最后,对那个根本无法归属的手稿片断“Ⅰ”,广松涉则干脆将其作为附录处置了。

这就是我们目前可以看到的广松版中译本中的手稿结构,比起1988年中文版来说,在手稿结构上显然已经有了较大的改变。

五

鉴于读者可以在阅读本书时直观地看到这份广松涉稿本的全部内容,所以我就不打算在此过多地纠缠于具体细节。详细研究过广松涉这个文献版以后,我有一正一反两点看法,不妨在此抛砖引玉,求教学界同仁。

首先,广松涉的这个文献版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研究域中最重要的版本比较研究的成果。它在直面文献原初语境的条件下,对已经出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篇手稿的不同理解逻辑和排印构架进行了有深度的文献学分析,并进而得出了自己全新的处理模式。这个文献学成果第一次让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了解到文献学在“回到马克思”过程中的关键性作用,也廓清了一些存在于文献学/文本学研究中的理论迷障。这一版本中译文的问世,无疑将成为我们进一步深入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研究的十分重要的新基础。因为这个文本使我们第一次能够直接面对马克思恩格斯创立历史唯物主义时一批最初文本的原有逻辑构架。并且,作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我们大概也是第一次在文本中直观地看到:

马克思是怎样修改恩格斯的文章的,以及马克思、恩格斯自身是如何推敲自己的文章的,通过了解这样的行文过程,可以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确立过程以及在该过程中两人所承担的工作量等方面,得出种种见解。^②

① 这个推论与我在20世纪80年代末研究此手稿中的想法完全一致。当时,我还没有看到广松涉的这个版本。

② 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附录一“《德意志意识形态》在文献学上的诸问题”,第342页。

毋庸置疑,这对我们深入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过程,了解当时每一个重要原理的提出、确定和修订的完整过程,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共同创始者这个历史事实具有重要的意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个版本使我们在证伪西方马克思学所制造的“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对立”之谬时,终于具有了最重要的直接证据。当然,这种文献学意义上的重要研究对那些不习惯于认真阅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的人来说,可能毫无意义。如同广松涉已经指出的那样:

有人也许会说:即便参照了被删除的文章和语句,考虑删改、修正的过程,或者区别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的部分,“也不会有什么大不了的不同”。对于习惯于随心所欲地引用只言片语,并以之来谈论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之类的人来说,基干部分的多处最终文形经历过差不多已经看不出其原形的大幅度删改——马克思、恩格斯是如何呕心沥血地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以及以之为基础的共产主义理论的,两人之间至少在当初存在过哪些不一致和微妙的差异——这些事情也许算不了什么。^①

然而,对对象文本严肃、认真和客观的态度是日益步上正轨的中国文科学术研究所不可或缺的,这一点已经越来越成为学界的共识,也是因此,我认定,这一文献学的研究成果必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础研究产生巨大且深刻的影响。

其二,对广松涉从自己这个研究成果中得出的一个结论,我却不敢苟同。上文曾经提到,从广松涉这一文献学成果中,人们将看到,在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的全程中,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合作何其紧密!这是真实历史情境的一种揭示,可遗憾的是,广松涉从中得出了一个惊人的判断:“在确立历史唯物主义以及与之融合为一体的共产主义理论之际,拉响第一小提琴的,限于合奏的初期而言,毋宁是恩格斯。”^②其实,在前面那段引文中,广松涉的这个判断已经表露无疑了——他说,马克思“修改恩格斯的文章”。那么广松涉何出此言呢?这是由于他认定,《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篇中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的最初文本是由恩格斯独立完成的。此外,通过对这一版本的研究,他发现:

如果将恩格斯的文章与马克思修正、增写的文章进行比较的话,能够发现两人的见解中还存在相当的距离。直截了当地说,可以清楚地看出马克思明显落后于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主要是出自恩格斯的独创性见解,而马克思则向

① 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附录一“《德意志意识形态》在文献学上的诸问题”,第357页。

② 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附录二“青年恩格斯的思想形成”,第358页。

恩格斯进行了学习这些情况。^①

广松涉的言下之意是,在历史唯物主义创立之初,恩格斯独立提出了这一科学的基本观点,而马克思不过是向恩格斯学习和弄懂了这些道理而已,所以,真正拉响“第一小提琴”的是恩格斯!倘若广松涉所言不虚,那马克思主义必须改名作“恩格斯主义”了!为此,广松涉还专门写过一篇著名的《青年恩格斯思想的形成》。^②

对广松涉这个失之轻率的判断,我十分不赞成。根据我目前的考证,广松涉之所以得出这一判断,原因主要有二:

第一,是广松涉对 1840 年前后青年恩格斯与青年马克思之间关系的判定。广松涉认为当时恩格斯的思想始终走在青年马克思之前,后者反而只是前者的追随者或者说学生而已。必须承认,这个分析倒不无道理。因为在 1842~1843 年期间,特别是在 1843 年夏天以前,已经走上共产主义立场并着手经济学研究的青年恩格斯与赫斯的思想都深刻于青年马克思。^③可是,这种状况在 1843 年夏天以后却逐步改变了。那个阶段,青年马克思先是在《克罗茨纳赫笔记》中通过对欧洲历史的系统研究,获得了全新的思想认识;其后不久,到了 1844 年,当他进入经济学研究之后,青年马克思即在理论逻辑和政治观念上超越了赫斯和青年恩格斯。而广松涉显然没有注意到 1843 年前后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和演进,其实,在 1845 春天之后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全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缔造中,马克思虽然与恩格斯始终保持着相当紧密的合作,但前者显然才是真正的主导性创始人。这是一个确凿无疑的历史事实!

第二,是广松涉在整理《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手稿的过程中所得出的直接结论。我们已经知道,这一手稿的主体部分,或者说绝大部分文本的笔迹都出自恩格斯,马克思的笔迹只限于少量的插入文字、栏外注释和对文本的修改。实际上,这个情况早在该手稿的第一个版本整理问世时开始,就已经是所有版本的编辑者们周知的了。最初的编辑者梁赞诺夫曾经提出了著名的“口述笔记说”:

手稿基本上是出自恩格斯的手笔。出自马克思的手笔的只有修正、插入以及若干的栏外补充。但是,从这一点不能得出应该将恩格斯视为著者的结论。毋宁说正好相反。特别是第一章尽管是两人共同的劳作,但给人留下的是马克思让恩格斯将口述笔记(in die Feder diktierte)下来了的印象。与此不同的是,

① 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附录二“青年恩格斯的思想形成”,第 364 页。

② 参见:《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附录二“青年恩格斯的思想形成”。

③ 参见拙著:《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一章第三节中的 3、4 两目。

第二章看来是马克思单独撰写的,而不是对口述的笔记。^①

另一个判断来自1962年发现那三页新手稿的巴纳。他也注意到文本主体部分呈现为恩格斯笔迹的事实,可他得出的结论是:“恩格斯的字易读而且写得快,……他每次都主动承担誊写工作。”^②我个人更倾向于后者的观点,因为在第一手稿的正文中,“恩格斯的笔迹像钢笔习字帖那样一目了然”^③(广松涉自己的说法)的情况看起来并不像是口述的记录,因为如果是马克思的口述,便不可能没有大的错误和修改,“誊写说”可能更合情合理一些。倘若让我来揣测的话,我想现在我们看到的主要文本,都是马克思原先字迹潦草,无法看清的初始手稿的抄写稿了,或者说已经是直接送交出版商的最终手稿了,可是,精益求精的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个最重要的第一篇手稿上,又进行了大量的修改和增写。

十分有意思的是,虽然众所周知第一篇手稿的笔迹是恩格斯的,但这个细节从来没有使人们另做他想,只有广松涉从中得出了与众不同的分析。他认为,手稿文本主体中的恩格斯笔迹证明了历史唯物主义是由恩格斯首先提出的。我想,广松涉这个判断十分牵强。我们不妨来看看广松涉自己在文本分析中的一个草率做法,即他对一个手稿写作中的例外的处理:

存在着这样一个值得关注的事实,那就是马克思在{10}c=[25]的后半部紧接着恩格斯的文章之后写了一段文字。马克思的文章一般写在栏外,而在此处却例外地紧接在恩格斯的文章之后在栏内写了一段文字,然后恩格斯又接着马克思的文章继续往下写。^④

这个事实本来正好说明了马克思与恩格斯在文本写作中保持的紧密合作关系,可是,广松涉却仍然得出相反的结论。他武断地说:“这一点不能成为主张第一部分从开头起就是两人直接合作产物的证据。从行文来看,在最初的撰写过程中主要是恩格斯在展开自己的论述。”这显然是毫无道理的推断。

另外,我认为在历史唯物主义科学是谁创立的问题上,不能主要根据《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的笔迹来推断,而必须依据整个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史的完整情况和他们各自内在的理论逻辑的具体形成过程来加以判断。在这一方面,我在《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一书中已经做了具体的讨论,在此不再

① 梁赞诺夫:《马克思恩格斯论费尔巴哈》,编者导论,《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1卷。参见:《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附录二“青年恩格斯的思想形成”,第372~373页。

② 巴纳:《马克思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参见:《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附录二“青年恩格斯的思想形成”,第273页。

③ 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附录一“《德意志意识形态》在文献学上的诸问题”,第337页。

④ 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附录一“《德意志意识形态》在文献学上的诸问题”,第352页。

赘述。一句话,全部青年马克思和青年恩格斯思想发生学的研究表明,马克思主导性地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科学。广松涉之所以得出这种错误判断,与他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史的理解不够准确有一定关系。在对手稿进行分析时中,为了证明马克思的思想落后于恩格斯,广松涉挑选了一个文本片断:即在第一篇手稿第 17 页上(中文版第 29~31 页),原来恩格斯笔迹的文本中描述了“共产主义社会不仅仅是作为基于财产共有制的社会,而是作为没有被固定化的分工的社会来被描述”,可是:

马克思在提出上述论点的恩格斯的文章中,在加上了“批判的批判者”、“晚饭后从事批判”等语句,将该部分的文章改成故意开玩笑的语气之后写道:“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社会体制],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现实的运动,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马克思的栏外增补证明当时的马克思还没有把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应该建立的社会体制、最终的社会体制来思考。^①

广松涉的判断是,此时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的理解远远落后于恩格斯,因为后者已经在将共产主义当作一种最终的体制来思考,而马克思则在设想共产主义仅仅是一种“运动”。其实,这是马克思非常著名的一句话,此处他根本不是在思考自己经过恩格斯抄写的原稿中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体制问题,而是突出批判了那种将共产主义仅仅作为一种价值悬设(现实应该与之符合)的抽象理想。显然,广松涉自己的理解出了问题,却武断地批评马克思。不过,如果排除广松涉所得出的这个不恰当的结论,他的研究对于反驳西方马克思学所制造的恩格斯与马克思“对立说”仍不失为一个重要的理论佐证。

六

下面,我想就《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篇手稿中有关马克思恩格斯第一次表述广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具体内容^②发表自己的一些粗浅看法,其实也是我对自己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对这份手稿所作的文本研究成果的重新说明。其中,当然也包括我对广松涉版所提供的最新成果的初步运用。我大致将分三个大的方面来进行讨论。

首先,对现在这份编译手稿中的“小束手稿”的理解将是十分重要的,这也是以往各种研究里争论和分歧最多的章节。可以看到,新编版本的小束手稿是马克思恩格斯最后写下的多层文本特殊接合的结果。我个人认为,最后完成的这个文本群实

① 广松涉:《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附录二“青年恩格斯的思想形成”,第 367 页。

② 关于我对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狭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区分,可参见我在拙著《马克思历史辩证法的主体向度》(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和《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中的具体讨论。

际上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制定完广义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新视界后,试图从总体逻辑上再次概括和升华自己新观点的两个不同角度的努力。正确理解这部分手稿内在逻辑结构的重要性,长期以来一直为人们所忽视,即便到 1965 年,多个新编译本先后问世后,仍然存在着某种相当不准确的估判。例如在新编俄文手稿的设计者巴加图利亚眼中,这部分手稿不过是马克思恩格斯未完成的两个誊写稿而已,而其中的第五手稿又是第四手稿的修订。十分遗憾,不少新译版本都认可了这说法,包括广松涉,也变相接受了这个观点。对此,我持保留意见,我认为这种理解严重低估了这部分手稿的意义。

我的看法是,小束手稿决不能简单视为马克思恩格斯对大束手稿的誊抄(仅仅从引言的内容或字迹工整的程度上做出判断是不足为据的),而是他们在基本理出新哲学基本构架后,打算(1)为第一卷改写一个“开头”(引言),以说明他们在第一卷中所进行的哲学批判的针对性;(2)是为第一篇中(其实也是全书)他们阐发的正面观点再加写一个“开头”(概论)。引言部分的内容十分清楚和确定,因为小束手稿的第一层和第二层手稿(在这个部分是一致的,可是,手稿在相同的引言之后,两份手稿中却出现了两种从不同的思路出发的“开头”。这也是理解该问题的难点所在。

在小束手稿中的第{1}~{5}张手稿中,引言就占去其中的两张多一点。广松涉在此处将{1}的 a、b、c、d 页作为引言的底稿列为双联页排印的做法是可以接受的。其中值得注意的是第 2 页最后删去的那一段话:“因此,在我们对这个运动的个别人物进行专门批判之前,首先提出一些能阐明他们的共同思想前提的一般意见。这些意见足以表明我们在进行批判时所持的观点,而表明我们的观点对于了解和说明以后各种批评意见是必要的。我们这些意见正是针对费尔巴哈的,因为只有他才多少向前迈进了几步,只有他的著作才可以 *de bonne foi*[认真地]加以对待”。^①这段文字是由马克思删除的。从这种针对性出发阐明自己的正面观点的作法,使马克思恩格斯自然形成了一个从“人”出发,以驳论为着眼点的理论表述的概要思路,我把这种作法称为从解决问题的视角展开理论表述。不过,必须注意到,所谓的以“人”为出发点指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新视界的理论起点,而是批判费尔巴哈等人旧哲学根本错误的基本出发点。以下,我们不妨随着这条思路做一个逻辑探索。

我发现,在被广松涉判读为由{6}d(第 11 页)开始的历史唯物主义经典表述的修改或誊清稿的{1}c、d 面、{2}a 那一部分文本,并不是广松涉所说的只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文字修改。我不赞成广松涉的这一判断。因为在手稿{1}c、d 面、{2}a 中紧接引言下去的作为 A 章开始的理论表述中,马克思恩格斯实际上针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由现象至本质逐步回答三个问题,即什么是社会历史发展的现实主体?什么是社会存在的本质?什么是社会存在中决定性的东西?用最简洁的语言来确定,“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

① 马克思恩格斯:《费尔巴哈》,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6 页注 1。参见:《文献学语境中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9 页。